

刘震云 | 拒绝遗忘

除了莫言,今年中国文坛最热的作家首推刘震云。先是8月份携新作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赴沪。11月底,由冯小刚执导、刘震云编剧的《1942》上映,其直面历史惨状的冲击力,激起了大范围讨论和争论。临近年底,收录了小说原著和电影剧本的《温故1942》出版,刘震云再次面对记者的追问,以总结的姿态谈电影、谈小说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充满笑声的悲剧

生活周刊:电影已经上映将近一个月了,反响巨大,作为原著作者和编剧,您接受了大量采访,最深的感触是什么?

刘震云:我有一个感慨,《温故一九四二》从小说到电影,媒体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你为什么写这个?”犹太人不会问斯皮尔伯格为什么拍《辛德勒名单》,这反映了不同民族对历史的不同态度:犹太人要记住,而我们要遗忘。遗忘有两种情况,一种这件事不重要,还有一种是重要的,可依然忘记了。1942年死了300万人,相当于奥斯维辛死难者的三倍,那用“遗忘”来概括还不够,而是“麻木”。麻木带来的历史后果,我们每一天都能感觉到。这也是我们拍《1942》的一个原因,用针刺一下“麻木”。

生活周刊:刺得效果如何?

刘震云: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开始关心了,问为什么要拍电影也是关心的一部分。我发现现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跟进了这件事,像发生地河南,那儿的媒体用120个版连篇累牍地报道当时的情况。有的记者像我们当初创作剧本那样,重走灾民的路线。

生活周刊:那观众的反应呢,很多人说电影里“笑点”比较多,不少场景观众发出了笑声,这似乎不太符合电影的氛围。

刘震云:这个我注意到了。不管是在北京的七千人体育馆首映,还是在我们去过的城市,和观众一块儿看电影,笑声不下十次。但我恰恰觉得这说明观众看懂了,唤起了人性中那个没有被唤醒的神经。我观察了他们的笑,包括声道、强弱、喷发的情感,这跟看相声和小品发出的笑声是不一样的。悲痛至极的时候他们也在笑,这叫大悲不弃、大恩不谢、大变不惊。这使我想起老舍先生说过的,他特别想写一出悲剧,但里面充满了笑声。可惜,这部作品老舍先生没写出来。

生活周刊:对年轻观众和读者有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?

刘震云:我跟小刚走了一些城市,像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深圳、香港、武汉、重庆、郑州,发现大部分观众是80后和90后,有趣的是,他们的观感跟40后、50后、60后有巨大的不同,他们用了个词:虐心。你看没看《一九四二》,他们说成“今天你虐了吗?”。我看到这句话非常感动。

过去大家看电影,放完了大家嗑着瓜子、拿着爆米花,挽着胳膊出来了。这次一直等到歌唱完、字幕完了,坐那儿还不走,为什么,一定是在思考:自己笑的是什么、笑的后面是什么?一个地主家的千金,最后沦落到妓院,第一次接客的时候吃得饱,蹲不下。这是真正的虐心了,80后、90后说是“被虐了一次”。什么叫虐心,不就是走心吗,就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了。证明这部电影像针扎一样,扎痛了没有经历过的人,促使他们思考。我觉得思考对于一个民族非常非常重要。

看完电影,再看剧本

生活周刊:您反复说过,《1942》的小说和电影不一样,您觉得把这样一部原本并非



刘震云

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,著名作家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一级作家。代表作《一地鸡毛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《我叫刘跃进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等。

他说

对1942年的河南人来说,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什么信仰,而是本能。在这种残酷的生存中,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。

——刘震云

《一九四二》的价值就是认识我们的民族性。影片中的老东家和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走完了逃荒路。两个陌生人瞬间成为亲人,正是我们民族的特点,这微弱的人性光芒,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会灭亡的原因。

——冯小刚

为电影而写的小说改编成电影,“丢失”了些什么?

刘震云:关键看你碰到了谁,碰到有的导演可能就丢失,要碰到小刚,反倒是像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,升到很高的地位。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能这样,我合作的导演也并不多,我说过,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,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,我就跟目光长远相处又愉快的人合作。什么叫愉快呢,就是大家能一起让这个事发酵,使它成长,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。大部分的人看一件事,先判断锅里有没有我,没他的份,就走了。

生活周刊:那为什么这次要出这本书,它不只是原著,还包括了电影剧本。

刘震云:一开始我也很迷茫。《温故一九四二》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出过了,电影也放过了,要不要把小说和剧本再合在一起出书,必要性有多大?但出版社方面说作用还是很大。首先,把这部小说编成电影本来是不可能的,原因特别简单,小说里没有任何电影元素,人物、故事、情节、细节都没有,它是怎么变成的、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?其次,这个电影筹划了19年,是什么让我们能坚持19年?

生活周刊:剧本的内容比电影更丰富吧,毕竟电影是要剪辑的。

刘震云:当然,最主要的是长度。小刚这样的大导演,电影院也才给了140分钟,他必须剪掉一些,比如瞎鹿找驴,因为篇幅的关系前后剪掉很多,看得就不过瘾。还有宗教这条线,电影里边确实有头没尾,这也是篇幅的问题。其实张涵予饰演的安西满,牧师托马斯·梅甘都是有结局的,安西满后来真的发疯了,被日本兵打死。这些内容在书里剧本里都存在,整个作品显得更完整。

另外看书的时候比较从容,可以往前翻,仔细琢磨。这本书把小说和剧本结合在一起,大家可以在看电影前先看小说,做好心理准备,看完电影后再看剧本,引发深入的思考。

生活周刊:就《温故一九四二》本身来说,它在您的创作里也很独特,它不像官场小说,甚至根本就不像小说,而偏于历史、纪实,但您又一直在说这是个小说。

刘震云:我觉着把作品用题材归类是不科学的,无论你用城市题材、农村题材、官场题材或历史题材,现实题材之类的。我觉得用一个词比较准确,那就是人性,一个民族特别独特的人性。把这个人性拿到世界民族之林,看它的胚胎是如何生根、发芽、长成了一个怎样的歪脖子树,对作家而言,这比题材和时间要重要得多。

生活周刊:这也是您想通过小说和电影达到的目的?

刘震云:那300万条生命使中国人有一些惊醒,《1942》不仅仅是一篇小说或一部电影,它超越了这个概念,而成为了民族记忆。有人说1942年的灾难不会再发生了,我说你错了,盛唐的时候西北也是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,北宋的时候,汴梁繁华得了不得了,到处是酒楼,歌舞升平,转眼到了南宋,特别快。所以中国人爱说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”,如果小说和电影能起到这个作用,不管是作者还是导演,目的是达到了。

文摘 | Digest

这一年,华谊邀王朔写了《非诚勿扰2》,四两拨千斤玩儿一样就赚了大把的银子。正在纸醉金迷不思蜀盘算着一不做二不休整他个《非3》时,王老敛起笑容对我说:趁着现在这个势,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《温故》拍了。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,但老刘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,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;有《温故》这碗酒垫底,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一绊了。王老又厚道地说:你怕什么?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,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?

——《温故一九四二——一个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》之冯小刚《不堪回首,天道酬勤》

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,与这个世纪同命运。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,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,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。在她身上,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。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,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。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。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,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。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。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,是自己人,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。

——《温故一九四二——一个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》第二章